

〈論說〉

在“美帝”与“友邦”之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1937—1945）

王 保 平
石 威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鉴于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后期，且忽略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本文试对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美国观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研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历经了从“美帝”转向“友邦”，最后又重回“美帝”的演变历史。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根本看法。它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迥异于既有政治势力如何定位与美国关系的革命色彩，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建构的成熟与发展。

关键词：美帝；友邦；美国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Between “American Emperor” and “Friendship”:

The American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WANG Baoping and SHI Wei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most of them focused o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and neglected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7 to 1945. This paper holds tha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American Emperor" to "Friendship",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mperor". A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cep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fundamental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United States. Its evolu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revolutionary color of how political forces position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American Emperor; Friends; American View;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eology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也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揆诸既有研究，议题主要涵盖了中共对美援的争取、中共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的对美政策等方面，时段大多集中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后期，且一些论述止步于单线型利益考量，忽略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¹因此，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

1 代表性研究诸如牛军《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刘中刚、孟俭红《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方小强、余震《试论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周勇、周昌文《70年后的再研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的考察（1942-1944）》（《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章百家《革命年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中共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周祖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吴宏亮、任中义《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殷露露《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

国观的演变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厘清的议题。中共在1937年前如何认知美国，1937年后的不同阶段又如何看待美国，不同阶段所形成的迥异的对美观感是怎样建构出来的，诸如此类问题，既关乎中共制定各项对美政策的基本判断，也划定了战后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因此，本文就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美国观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以期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变迁提供片羽之见。

一、“美帝”的转向：美国虽然不是敌人， 但远未成为朋友（1931-1937）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美帝”的观感起始于五四时期。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知识界深感“公理”与“正义”皆被“帝国主义”出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胡适、毛泽东等皆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其理想主义大失所望。自此，在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五四青年的观察中，美国形象开始流入“帝国主义”之列。

20世纪20年代，列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指出世界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也包括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²这直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反帝”观念。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确立了在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西方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格局。此举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一致愤慨，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张太雷等纷纷发表文章，掀起对华盛顿会议的舆论批判。1922年，共产国际组织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

作问题再探》（《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崔玉军《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贾钦涵《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张牧云《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初步合作》（《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2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4-115页。

体代表大会，中国代表39人参加。“这次会议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经基本明确，其中许多思考作为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⁴当时，革命的矛头主要指向直系军阀，因此，美国作为直系军阀的后台，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开始与军阀联系在一起，成为“反帝”宣传的头号标靶。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此时，革命的矛头指向国民党“新军阀”，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也形成了新的轮廓：作为与蒋介石政府“吊膀子”的美帝国主义，其面目虽然“姣好、和平、可亲”，实则是“制中国民族死命的最后魔王”。⁶因此，当时的主要政策即“反对乘机侵略的美帝国主义”，也“反对国民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美日是一丘之貉，“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⁸正是在这一认识下，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我们的党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⁹1935年，共产国

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4 毕玉华：《建构与调适：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概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30-31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1925年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1页。

6 《中央通告第20号——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1928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35页。

7 《中央通告第62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1928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68页。

8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6页。

9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支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际“七大”召开，号召各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同一切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¹⁰这一判断虽仍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但也首次认为有必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发展“同盟条约的关系”。这说明，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号召。

1936年1月28日，苏维埃政府外交委员长王稼祥通过《红色中华》，进一步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们当前的死敌既是日本，则只要对我们反日战争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们的友邦，我们都乐于和它成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¹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友邦”称呼苏联以外的国家，这为美国观的转向提供了可能性。6月，美国记者斯诺到访陕北，采访毛泽东。斯诺曾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毛泽东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¹²此后，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没有经历过封建统治，而有独立战争和解放黑奴战争的革命传统，又有重视科学和讲求实际的精神，每个民族都

10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9页。

11 《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12 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有自己的优点，而在求实精神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向美国人民学习。¹³毛泽东还破天荒地将美国视为“民主国家”，并认为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¹⁴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将美国与日本混为一谈，“美帝”开始转向。

1937年，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5月，毛泽东在党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便将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中国与苏联应该联合起来”。¹⁵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7月19日，《新中华报》报道：“世界各国在朝在野的人士对日军这种强盗行为，均异常愤慨。英法美等国的报纸均极力攻击日寇的非法行为，对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精神表示热烈的同情，足以证明我们在抗战活动之下，一定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拥护。”¹⁶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党报上。8月，淞沪会战爆发。《新中华报》报道：“美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非常高涨……足见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抗战是非常同情与援助的”。¹⁷“美帝”的转向逐渐公开化。

11月，九国公约会议使得中国对国际调停的希望落空，再加上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失望情绪弥漫。中国共产党人判断：美英法等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只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援助；而国民党对其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政策，也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¹⁸相应的，《新中华报》上也出现了讽刺的声音：“美国始终不

13 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年1月29日，第3版。

14 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15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及结论》，《党的政策选集》，晋察冀日报社，1946年，第14页。

16 《日寇进攻华北行动，世界人士无不愤慨》，《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17 《美人反日运动高涨，在日大使馆前示威，警告日本的野蛮行为》，《新中华报》，1937年10月14日。

18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1页。

肯一个国家来出头，要把英国拉出来，取得英美共同行动。可是老奸巨猾的英国，则又默不作声。”¹⁹周恩来公开表示：“九国公约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²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虽已不将美国视为敌人，但观念中仍带有强烈的不信任色彩。在形势不稳定的前提下，任何失望的情绪都极易为“美帝”的转向投下曲折反复的变数。因此，到1937年底，美国观的基本定位是：美国虽然不是敌人，但远未成为朋友。

二、“美帝”的回落：美国是“带着朋友面具的扒手”（1938-1941）

1938年2月，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谈及“美国的感想”，毛泽东讲到：“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明确希望美国能“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正说明此时毛泽东虽对美国抱有期待，但不满于“口惠而实不至”的现状。

与位居延安的毛泽东相比，身处武汉积极开展对外联络的王明则展现出更积极的姿态。他认为，美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²¹，它将在中国抗战以及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此时国民政府外交致力于和英美的亲近“是非常正确的外交政策”，应该“热忱的拥护”。而且，“任何污

19 《九国公约会议将在北京举行，美愿各签字国实行合作》，《新中华报》，1937年10月19日。

20 《目前抗战危机与华北坚持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汉口），1937年11月16日。

21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193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8页。

蔑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反对英、法、美民主国家的论调，非为法西斯蒂侵略的辩护说法，即为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有害空谈”。²²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其中指出，对于国际援助“不应作过大希望”，中国应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毛泽东提醒：“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²³可以看出，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武汉方面在美国观上是存在差异的。这是双方在如何看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思考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之关系等问题上认知不同步的具体体现。这其中或牵涉着中共中央与武汉方面的矛盾对冲，也显示了延安与国统区在社会文化语境上的巨大张力。

1939年，国内外局势突变。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联合对象的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²⁴紧接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构想，重新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策略。与此同时，国共之间摩擦不断，毛泽东怀疑“最近的摩擦，都与英美政策有关”²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

22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193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8-959页。

23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解放》，1938年第57期，第4-33页。

24 杨奎松：《革命（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93页。

25 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杨奎松：《革命（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93页。

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²⁶。英法美等国虽“非侵略国”，但它们对侵略国采取“放任政策”，这是其“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政策。²⁷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逐渐恶化。

相应的，此时《新华日报》在报道上突出了美国追逐利益的一面。“我们希望美国能顾及中美休戚与共的关系，不再拘泥于眼前从日寇哪里获得的小利。”²⁸“从美国在华的利益来打算，美国是不该继续以军火供给日本的，继续与日本订立商约是一种明白白的自杀。”²⁹相较于国统区舆论诉诸美国理想主义的想象³⁰，《新华日报》的报道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侧重美国现实主义的考虑。

1940年，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反共活动愈演愈烈。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号召，指出“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是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新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善于进行耐心说服解释工作”，使广大人民“从国民党英美派的欺骗宣传下解放出来”。³¹与此同时，毛泽东甚至想象到最黑暗的情形：“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³²

到1941年上半年，美国与日本进行最后的谈判，国际局势日益变幻难

26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2页。

27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8页。

28 《美日关系的新发展》，《新华日报》，1939年9月28日。

29 《日寇侵华与美国在华利益之损失》，《新华日报》，1940年1月7日。

30 王保平、涂晓华：《从自相矛盾到全面依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抗战舆论中的美国观（1937-1941）》，《新闻春秋》，2017年第1期。

31 《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32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1979年，第475页。

测。中国共产党人担心，英美正在执行的方针是在西方逼德反苏，在东方英美日华妥协反苏反共。³³相应的，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美国沦为了“带着朋友的面具的扒手”³⁴。“他们（美国）是并不爱惜中国的，他们是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者，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他们是愿意给予日本很多东西的，橡皮、油、棉花、机器，应有尽有，还在其次，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丘吉尔的锦囊里面的，远东慕尼黑绝不是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³⁵《解放日报》同时嘲讽了国民党寄希望于“美国公开参战”的论调：“国民党最缺乏的是民族的信心。你们如今对于美国的捧场和依赖已到了什么田地，请问有史以来，美国对中国曾负过什么盟约的义务呢，美国对我又有何皇恩浩荡之处，使我堂堂奋斗中的伟大民族必须肉麻当有趣，自丧国格，自毁人格，至于斯极？”³⁶可以说，在此时的公开表达中，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抱有极度的不信任，美国观基本回落到1935年前“美帝”的定位。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形势的不稳定和复杂多变正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³⁷而苏联外交环境的恶化从宏观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狐疑和不信任感。从国内环境来说，国共关系的恶化关涉着中国抗战前途，加剧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的危险，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斗争考虑，势必重回反帝的公开表达。这些因素都是导致美国观回落到“美帝”定位的直接原因。

三、“友邦”的认可：美国是“最典型的民主国”“最亲密的战友” (1941-1944)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局势瞬间恶化。德国的突袭既证明了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外策略的失误，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34 《谨防扒手》，《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

35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解放日报》，1941年5月18日。

36 《国民党缺少什么》，《解放日报》，1941年6月17日。

37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对美国作出了全新判断。23日，即苏德战争第二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此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³⁸。26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³⁹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强调“对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并认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不会错的”⁴⁰。随后，中共中央重申：“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以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联合一致。”⁴¹由此可见，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联合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美国观迅速回暖。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发表的评论、宣言中，对英美不再使用帝国主义的措辞，而改称为“友邦”。⁴²当时，《解放日报》将当时日美之间的秘密交涉定义为“侵略国与反侵略国之间，两个营垒之间的外交战”。⁴³《新华日报》进一步倡议，“发挥中苏英美四大民主国家联合反对法西斯集团，尤其是行将打成一片的东西法西斯恶魔势力的威力”。⁴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应，接连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

3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页。

3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9页。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41 《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42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43 《两个营垒之间的外交战》，《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日。

44 《美国对日应该当断力行》，《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1日。

意义”。⁴⁵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⁴⁶至此，美国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一方面是以积极的态度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是赞颂美国的民主政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

1942年至1943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好感持续升温。在公开表达中，《解放日报》对于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给予了重新评价：“不应单独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应看先打什么对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有利。”⁴⁷而且，对于美国的力量极具信心：“美国的力量还在猛烈的增长着，日本法西斯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⁴⁸《新华日报》对于美国的民主政体表示赞颂，认为美国代表了“真实的民主精神和真实的民主的战士”⁴⁹。对于美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的民主主义已在世界历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无畏精神给予他的人民了”。⁵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曾连续三次邀请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建立与美国实质性的联络关系。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4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同一天刊发了著名的《祝美国的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且是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文章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光荣传统追溯到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历任美国总统，将他们一一视为光荣传统的“伟大代表人物”。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已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接下来，在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民主化方面，它亦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

45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

46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47 《毛泽东同志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7日。

48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发表的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

49 罗泊：《真实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50 钟颖：《美国人民的理想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⁵¹

8月7日，美军观察组再次分批抵达延安。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说：“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中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们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⁵²1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将对美外交列为开展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根据这份指示，中共与美国逐渐开启了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积极合作。⁵³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交谈中明确表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现在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⁵⁴。也正是这次交谈，令谢伟思感到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⁵⁵9月10日，中共中央更在给前线部队的电报中指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⁵⁶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美国作为“友邦”既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可，也直接推进了双方合作关系的实质进步。而且，对于美国的好感甚至一度超越了对苏联的认可。胡乔木曾回忆，“我们历来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为辅助的外援究竟在哪里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美国的希望那么殷切，反映

51 《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

52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53 章百家：《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1921-1947）》，《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院》，2015年第2期，第96-97页。

54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页。

55 约翰·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3页。

56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的电报》（1944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7页。

出我党和苏联关系虽然经历的时间那么久，但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苏联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美国”。⁵⁷这种看法应该代表了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切体会。

四、“友邦”的决裂：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1945-1946）

1944年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共两党开始积极谋划战后秩序，而美国也游走于国共之间，直接介入国共谈判。9月，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并指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主要的政治斗争目标”。⁵⁸自此，积极利用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促进中国民主改革，成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与国民政府、美国之间斡旋的主要议题。然而，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美国，它们在谈判过程中的反复和阻滞，最终使得联合政府的主张无疾而终。⁵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好感开始降温。

11月，为了协调国共谈判，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访延安，与中共达成五点协议。但紧接着，赫尔利背弃协议，出尔反尔，直接令毛泽东十分不快⁶⁰。他在致电王若飞时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强拉我们如此做。”⁶¹协调的困局使得赫尔利孤注

5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89页。

58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等的指示》（1944年9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

59 其谈判具体过程可以参见，吴淑凤：《中共的“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政府的对策（1944-1947）》（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民国的政治逻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

60 关于赫尔利在国共双方谈判中的经历，详情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187页。

6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一掷，选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府，迫使中共妥协。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认定中共及其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因此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⁶²。5日，《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指出：赫尔利的讲话“只是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并且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⁶³4月9日，毛泽东针对《新华日报》的社论，批语“延安暂取不理态度”⁶⁴。

5月31日，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阐述了新的对美认识：“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⁶⁵这是1942年以来毛泽东对美国首次以“帝国主义”相称，它意味着美国观已经回落到“美帝”的边缘。

此后，《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新华社记者评论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动向》《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文章，明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租借武器，否则便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友谊的举动”⁶⁶。而且，文章更鲜明地将矛头对准赫尔利：“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因为这些老狼的目的，和中国的独夫民贼的目的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去

564-565页。

62 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240页。

63 《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6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90页。

65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66 《新华社记者评论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动向》，《解放日报》，1945年6月8日。

鲜血。”⁶⁷“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美国的这种政策继续下去，“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⁶⁸这是194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公开表达中首次批评美国。应该说，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前后摇摆，直接摧毁了“友邦”的形象。

1946年初，中国一度出现“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曙光，中国共产党也采取过“中立美国”的政策，在对外宣传上缓和对美国的舆论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党放弃了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种策略的本身恰恰是一种反干涉措施”⁶⁹。同年下，国共内战迫在眉睫，美国为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兵力，抢占军事先机的行径，戳穿了美国一直所倡导的“自由”与“民主”的假象。8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政府过去讲给我们听的，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中美平等，美苏合作，肃清日本侵略势力，但一年来它的所作所为，说白了，不过是帮助蒋介石漂亮地实现独裁和消灭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民主。”⁷⁰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美帝”的认知，不仅是“中国民众的敌人”，更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国共产党最终与美国分道扬镳，走向完全对立的两面。

结 语

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历经了从“美帝”转向“友邦”，最后又重回“美帝”的演变历史。这其中不单牵涉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其背后更蕴含着美苏、中美、国共等多边因素的影响。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根本看法。它

67 《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

68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5页。

6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70 《一年来的教训》，《解放日报》，1946年8月27日。

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迥异于既有政治势力如何定位与美国关系的革命色彩，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建构的成熟与发展。

不同于既有政治势力面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软弱性和投机性，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将民族的独立自强同“反帝”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所追求的是国内和国际双重意义上的彻底革命。因此，美国观的演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变化和具体的利益考量，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调适如何借助美国力量实现政治目标的一次次尝试。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旨归，这与近代以来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如何宰制中国的图谋，天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双方的亲近是短暂的，分道扬镳才是必然，这也基本预示了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

与此同时，美国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自我建构的话语产物。在公开表达中，美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运筹策略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观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明晰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找寻到不同策略的因应，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身意识形态走向成熟与发展的直接写照。